



## 德帝国晚期和魏玛共和国时期 中国文化热原因初探

陈从阳 桂 莉

**摘 要:** 德帝国晚期和魏玛共和国时期出现的中国文化热是多重因素交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19世纪末期以来欧洲工业化快速推进所引发的社会阵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文化的深刻危机,迫使欧洲特别是德国学者企图用东方特别是中国哲学精神根治西方社会弊端,期待从东方寻回疗救自身的灵药和补正自身文化的方略。中欧、中德悠久的历史交往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德新型关系的确立,也为中国文化热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关键词:** 德意志帝国; 魏玛共和国; 中国文化热; 原因

19世纪晚期,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快速推进和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的过渡,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各主要国家已日益联系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国际范围的文化交流日益活跃。这一时期,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出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热。囿于篇幅,本文仅对德帝国晚期和魏玛共和国时期中国文化热产生的背景作一全面的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 一、中德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中德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古希腊时期,中国作为充满神话故事的国度就萦绕在欧洲人的脑际,古希腊人称中国人为“许佩博雷人(hyperbo-aneaner),即极北人,意指那些“居住在比北风地更遥远地区的人”<sup>①</sup>。古罗马人称中国为“塞里斯”(seres),该词由汉语“丝绸”的“丝”字派生而来。

在德语国家和地区,大约公元1000年左右,诺特克尔·托伊托尼克尔(Notker Teutonikus)在其关于波伊提乌(Boethius)的评论中,首次用德语提到塞里斯人,意指一个遥远、梦幻般的亚洲国家,以生产丝绸著称。目前,可考的第一个踏上中国土地的德意志人,是公元1303年由科隆到元大都布道的天主教方济各会神甫阿尔诺德(Bruder Arnold)。1477年轰动欧洲的《马可·波罗游记》第一次译成中古高地德语在纽伦堡出版,开始使“中国”深入到德意志民间。

“1500—1800年的3个世纪,是中国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产生较强影响的时期”<sup>②</sup>。伴随着耶稣会士来华,16世纪末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得到了亘古未有的拓展,出现了第一次高潮。中西文化交流第一次高潮主要流向“是自东而西的”<sup>③</sup>。伏尔泰曾言:“欧洲的王族同商人在东方所有的发现,只晓得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道德的与

① 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0页。

② 孟德卫:《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13页。

③ 杨武能:《歌德与中国》,三联书店1991年,第4页。

物质的世界。”<sup>①</sup>中国儒家学说和伦理道德成为欧洲启蒙思想家鞭挞专制欧洲的巨杖，建构自己思想学说与政治乌托邦的利器。

德意志著名哲学家莱布尼茨是“认识中国文化对于西方文化发展的重要性”的第一人<sup>②</sup>。1697年，莱布尼茨编辑出版《中国近事》，表露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巨大热情。他在序言中宣称：中国和欧洲两大文化源泉相互交往将大有裨益于双方。他还认为：“鉴于我们道德急剧衰败的现实，我认为；由中国派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的运用与实践，就像我们派教士去教他们由神启示的神学那样，是很有必要的……假使推举一位智者来裁定哪个民族最杰出，而不是裁定哪个女神最美貌，那么他将会把金苹果交给中国人。”<sup>③</sup>莱布尼茨坚信：相隔遥远的民族，相互之间应建立一种交流认识的新型关系。从1696年起，莱布尼茨致力于创建柏林科学研究院，以打开中国门户，使中国文化同欧洲文化互相交流。

莱布尼茨的思想在他的学生克里斯蒂安·沃尔夫那里得到了发展。沃尔夫推崇中国儒家伦理学。1722年，他在哈勒大学发表《论中国的实践哲学》，将孔子伦理学和基督教的伦理学相提并论：“我是基督徒，但孔夫子的伦理绝不是与我的宗教不可调和的，而且它也完全符合自然伦理。”此外，他对中国的教育组织以及中国对于实用伦理的重视赞不绝口<sup>④</sup>。

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罗可可”风格在欧洲风靡一时。这种以其浮华、精美、艳丽、文雅等闻世的艺术风格“支配了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情趣”，它“充满中国特征”，“直接得自中国”<sup>⑤</sup>。

在信奉天主教的德语地区（德国南部和奥地利）和柏林、勃兰登堡州地区，罗可可之风更为炽烈。崇尚追逐包括瓷器、丝绸、漆器、园林、建筑在内的中国艺术情调蔚成风气。

德意志人偏爱中国青瓷。1709年，波特格尔和哈尔恩豪森在德累斯顿附近迈森烧制成硬瓷。自此以后，迈森以生产精美瓷器驰名欧洲。在奥地利维也纳美泉宫中国室、德国斯图加特附近路德维希市的路德维希堡宫中国室、德累斯顿茨温格宫的瓷器馆、柏林蒙彼尤宫（梦碧游宫、后改为霍亨索伦博物馆）、巴伐利亚州安斯巴哈宫的“镜室”（明镜沙龙）和“骑士瓷室”（士绅瓷室）等均有大量瓷器收藏。在德意志，17世纪下半叶风行手描的丝绸，从1673年起开始风行印花丝绸。18世纪50年代，德意志艺术家施托帕瓦塞尔开始在安斯巴哈生产并出卖漆杖，这种漆杖被弗里德里希大王在军队中广为使用。1763年他在不伦瑞克成立特许漆器厂，上漆的鼻烟壶举世闻名。17世纪后，德意志许多家庭对用中国壁纸作壁毯产生了固定偏好。自18世纪开初第一年，在德意志掀起了“轿狂热”。科隆大主教克莱门斯·奥古斯特必须乘轿子才赴其辖区。迟至1861年，纽伦堡市政府还为庆祝轿子而公布《轿法规》。中国风格的建筑“中国园林”、“中英式园林”在德国颇为流行，其最典型的罗可可建筑是德累斯顿庇尔尼茨欢乐宫和波茨坦的桑苏西宫，还有科隆主教区的“中国乡村别墅”。1773年，德意志作家翁策尔在《中国园艺论》一书中指出：“中国的园林是一切园林艺术的典范。”<sup>⑥</sup>

值得注意的是，17、18世纪在德意志还产生了一大批以中国为题材或假借中国人之名所写的各类讽喻时世的各类文学作品。远在17世纪的巴洛克时代，就有不少文学作品写到中国，如被喻为“德语诗歌之父”的奥皮茨（M. Opitz）的长诗《歌颂上帝的战争》（1628），开德国流浪汉小说之先河的格里美尔斯豪斯（H. J. Ch. V. Grimmelshausen）的《痴儿西木传》（1669）等。真正以中国历史为基础的文学作品，是脱胎于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鞑靼战纪》的哈格多恩（Christ. Wilh. Hagedorn）的小说《埃关——或伟大的蒙古人》（1670）、哈佩尔（E. W. Happel）的小说《亚洲的俄诺干布》、洛恩施坦因（D. C. V. Lohnstein）的小说《宽宏的统帅阿米尼乌斯》（1689）。其他的文学作品还包括法斯曼（D. F. Fassmann）的书信体小说《奉钦命周游世界的中国人》（1721）和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书信体小说《中国皇帝的使臣菲希胡发自欧洲的报道》（1760）、普费弗尔（G. K. Pfeffel）的“道德小品”《寓言与故事》、哈勒尔（A. V. Haller）的“国事小

① 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91页。

② 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69页。

③ 夏瑞春：《德国思想家论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页。

④ 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第441页。

⑤ 赫德逊：《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1995年，第247页。

⑥ 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483页。

说”《乌松》(1771)、《阿尔弗雷德——盎格鲁萨克逊的国王》(1773)和维兰德(Ch. M. Wieland)的“国事小说”《金镜》(1772)等。

17、18世纪在欧洲和德国出现的中国热使中国文化在德国的影响一度达到高潮,中德文化漫长的交流历史为德帝国晚期和魏玛共和国时期中国文化热奠定了基础。

## 二、欧洲文明和德国文化的危机

德帝国晚期和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中国文化热是19世纪末期以来、特别是一战后欧洲(尤其是德国)的社会和文化危机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反映。

自19世纪中叶以来,欧美工业化快速推进,工业文明凯歌行进不仅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空前紧张,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贫困、失业、社会两极分化、城市与工厂条件的恶化等。物质主义、工具理性、个人主义的泛滥,还造成了人类生存状态的异化和人自身心灵之间、理智和情感之间的尖锐撕裂,整个社会经受着社会转型的阵痛。1869年,斯拉夫主义的传人之一丹尼里夫斯基在《俄罗斯与欧洲》中预言:西方文明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败坏和沉沦。该书在19世纪末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风行一时。

尼采站在非理性主义和主观主义哲学的立场,以前所未有的率直抨击了西方文明价值观对进步与人类理性精神的普遍信仰。他认为:西方文明已失去创造力而陷入平庸,基督教的奴隶道德为软弱、卑贱戴上了光环。它将欧洲传统道德的支柱——理智、民主、进步、荣耀等一一押上审判台,提出“打倒偶像”,声称“上帝死了”!要“重估一切价值”。他还声称:复兴文明的唯一希望在于一小部分超人。在西方“大量男女正觉得自己游荡在一个陌生、动荡与失控的世界里,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在一个焦虑的时代,一个危机重重的时代。”<sup>①</sup>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自法国革命与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次重大转折”<sup>②</sup>。战争期间,欧洲3000多万人死伤,各交战国经济损失高达2700亿美元,无数城市和乡村沦为废墟,大批工厂、铁路、桥梁、房屋毁于一旦,欧洲的物质文明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比物质损失更为严重的是:大战使欧洲人第一次深深怀疑西方文明的基本走向,并引发了世界历史上几乎无与伦比的精神危机<sup>③</sup>。

20年代初,法国诗人兼批评家保罗·瓦里希面对欧洲战后的惨相,不禁满腹酸楚:“暴风雨已经平息,可是我们仍旧忧心忡忡、惶惶不安,好像暴风雨又将来临。人类几乎所有的一切仍然是动荡不宁的……我们茫然于新事物,对未来充满了没来由的恐惧……已经没有一个思想者……有信心控制这种焦虑,无论他多聪明、多博学,都无法从这片黑暗中脱身而去。”<sup>④</sup> A. J. P. 泰勒总结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断难符合按有序阶段推进的理性文明的图景。20世纪文明人类在野蛮方面较所有先前时代的野蛮人更有过之。他们的文明美德——组织性、机械技术、自我牺牲——使战争更野蛮、残暴和可怕。现代人已开发出他们不配使用的力量。经过权衡,欧洲文明还存在不足。”<sup>⑤</sup>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1919年3月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在反对战前形势的工人中间,存在着一种不仅是不满,而且是忿怒和反抗的强烈意识。所有现存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秩序都受到了欧洲各地广大人民的怀疑。”<sup>⑥</sup>1936年荷兰史学家约翰·惠辛加在《世界末日的恐惧》中描绘了两战间普遍的社会心理:“我们生活在一个疯狂的世界中,……到处都有对我们的社会结构的稳定性的怀疑,对于最近的未来抱有模糊的恐惧,感觉到我们的文明正在走向毁灭……几乎所有的曾经一度是永恒的东西——真理、人道、正义和理性——现在都变成不确定的。……我们正在一个势必全面崩溃的文明的强烈危机中生活,这样一种感觉正在广泛地蔓延开来。”<sup>⑦</sup>一战后影响最大、最能反映对西方文明失望之情的是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的惊世骇俗的

① 约翰·巴特勒、贝内特·希尔、约翰·麦凯:《西方社会史》第3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50页。

② 约翰·巴特勒、贝内特·希尔、约翰·麦凯:《西方社会史》第3卷,第200页。

③ 齐世荣、廖学盛:《20世纪的历史巨变》,学习出版社2005年,第428~429页。

④ Paul Valéry. *Variet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27, pp. 27~28.

⑤ A. J. P. Taylor. *From Sarajevo to Potsda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6. pp. 55~56.

⑥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614~615页。

⑦ 马文·佩里:《西方文明史》下,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457页。

名著《西方的没落》。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斯氏以历史文化史观为统领，以充满“浪漫主义的、悲观主义的、‘世纪末’的”笔调，描述了西方文明行将没落的前景：“在我们的面前，所出现的，是一种最终的精神危机，行将席卷整个的西欧和美洲”<sup>①</sup>。在欧洲，经过一战，对西方文明失去信心已“成为了西方思潮、大学，甚至宗教生活的主流”<sup>②</sup>。

伴随着西方文化的危机，欧洲“东方文化救世论”的思潮甚嚣尘上。1920年3月，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致泰戈尔信中的一段话颇具代表性：“在这场表明欧洲无耻失败的世界大战的浩劫之后，欧洲自己已不能保卫自己，这点是很清楚了。它需要亚洲的思维，正如亚洲从欧洲的思维中获得了裨益一样。人脑有两个半球，倘若一个僵死，那么整个身子会衰弱下去的。必须重新联接两个半球，促使身体健康发展。”<sup>③</sup>正如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罗梅君教授指出：19世纪末以来，欧洲对自己的文明渐感厌倦和失望，“中国同整个远东一样，被视为同本国文明‘相反而值得向往的世界’，视为本国文明所梦寐以求的选择对象”<sup>④</sup>。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德国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德国将近200万人在战场丧生，100万人死于饥饿和瘟疫，还有400多万人受伤。战后德国工业总产值不及战前一半，到1918年底马克贬值40%。战后德国生产萎缩、物价飞涨、民生凋敝、社会动荡。屈辱的《凡尔赛和约》更使德意志民族从发展的顶峰跌落到民族灾难的谷地。《西方的没落》在一战后的德国激起了广泛共鸣。“一时风气之盛，势力之伟，其在战后德国，盖与安斯坦（今译爱因斯坦）氏所为相对论并称。”<sup>⑤</sup>

早在大战进行期间，奈方（Nathorp）就预言：“今日奄奄一息的西方，重新面向涌现神灵的阳光之处，人类及人所有的关于上帝和神灵宏伟梦想的真正诞生之地——即东方”<sup>⑥</sup>。一战后，满目疮痍的德国急需休养生息。东方智慧的宁静自得对于为战后重重精神问题所困惑的德国精英和大众、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产生了持久的吸引力。1921年，卫礼贤在《东方之光》中，描述了战后欧洲特别是德国兴起的“东方热”：我们西方人“却越来越多地转向东方，自觉接受东方的宗教与文化题材。这种情况甚至发展到如此地步：许多人失望地疏远自己的过去，到东方去寻求全部福祉，这股东方潮在我们整个精神生活中都能觉察得到。”<sup>⑦</sup>荣格1930年在《纪念理查德·威廉》讲话中强调：“东方的精神的确拍打着我们的大门。我觉得，在我们这里，实现这种理想、寻求天道，已成为一种集体现象，这种现象来势之猛烈，超过了人们一般的想象。”<sup>⑧</sup>德国的中国传统文化热也为中国留德学生所证实：当时“德国思想界，有两大潮流，一为新派，一为旧派。所谓新派，大都出自言哲学美术与诗学者，彼辈自欧战争后，大感欧洲文化之不足，而思采纳东方文化，以济其穷，于是言孔子、释迦哲学者，皆大为社会所尊重，如凯热儿林（今译为凯瑟林），如蔚礼贤（今译卫礼贤），如史奔格列儿（今译斯宾格勒），皆其例也。所谓旧派者，仍尊崇自然科学万能，不为时潮所动摇……此两大潮流中，新派极占势力，所谓旧派者，几无声息”<sup>⑨</sup>。

在卫礼贤看来：这股东方文化热是深具社会历史背景的时代大潮，并非喧嚣一时的流行风潮：“当以积极主动为特征的欧洲思想在军事上达到军国主义顶点并开始出现转折时，总是从东方传来一种镇静、内敛因而有效的思想倾向。”<sup>⑩</sup>德国学者利奇温曾对德国战后老庄哲学风行的原因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其一：《老子》一书，以虚静为道。“一个经过机械时代的喧扰竞夺的人，需要宁静与恬息，就从老子之‘道’，学得如何克服外物”。其二：老子的无为无不为的思想，倡言的“是一种责任”，能够激励“断然属于精干和有进取心类型”“最优秀的人”。“但对于天性趋向于极端的青年人，它会有一种危险性”，它会

①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313页。

② 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8页。

③ 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泰戈尔传》，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第347页。

④ 罗梅君等：《异国情调与现实——17世纪至20世纪中叶德国游记里的中国》，载刘善章：《中德关系史译文集》，青岛出版社1992年，第357页。

⑤ 李思纯：《论文化》，载《学衡》1923年第22期。

⑥ 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第3页。

⑦ 蒋锐：《东方之光——卫礼贤论中国文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第205页。

⑧ 夏瑞春：《德国思想家论中国》，第274页。

⑨ 魏时珍：《旅德日记》，载《少年中国》1921年第4期。

⑩ 蒋锐：《东方之光——卫礼贤论中国文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第206页。

引取“好静恶动的心理,用来对抗当代的积极的‘活动主义’(Activism)”。其三:老子哲学中“回到自然”的呼声,同是那时青年运动口号之一。“他们对于作为19世纪特色的人类文化及道德提高的不断进步,已经失去信心;他们宁愿回到原始的状态”。老子寻求以人道配合天道,正是这样的理论。《道德经》成为沟通东西文化的桥梁<sup>①</sup>。

19世纪晚期、特别是一战后,西方特别是德国学者梦想用中国哲学精神根治西方社会弊端,“借中国智慧,释自身焦虑”<sup>②</sup>,倾向于将中国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期待从那里寻回疗救自身的灵药和补正自身文化的方略。“欧洲史上东亚第二次在精神上与西方接触”应运而生。

### 三、中德新型关系的建立

一战后魏玛共和国与中国新型关系的确立,为两国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契机。

在欧洲列强侵华的行列中,德国无疑是一个姗姗来迟的后来者。1861年,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德通商条约》。翌年,普鲁士第一位常驻中国代表抵达上海。德国的统一加快了其在华拓展势力的步伐。甲午战争后,德国利用巨野教案武力入侵山东胶澳,并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胶澳租界条约》。德国武力侵占胶州湾引发了19世纪末期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

1900年德国积极参与“八国联军”对华侵略,镇压义和团运动。德国元帅瓦德西出任八国联军总司令。德皇威廉二世在给远征师团饯行时发表了一番臭名昭著的讲话,称中国人为“黄祸”。德国当时著名战地记者鲁道夫·扎贝尔描述了他自己和许多同时代人的看法:“中国应被作为这样一个国家来对待,人们要有意识地强迫它服从欧洲的统治,从而达到对其进行政治和贸易统治的目的,或通过长时期控制中国的内政来防止‘黄祸’,为达此目的,可使用融合两种文化的和平方式,如果行不通,就应使用武力。”<sup>③</sup>

中华民国建立后,德国支持袁世凯反对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阴谋活动,随后扶植北洋军阀发动北京政变。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德国大大扩充了在华经济势力,并加强了文化渗透。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彻底改变了远东和国际关系格局。1917年8月,中国正式对德、奥宣战。德国战败后,《凡尔赛和约》废除了德国在华的一系列特权。由于《凡尔赛和约》悍然将德国山东权益转让给日本,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1919年9月,中国政府宣布结束对德战争状态。

一战后建立的魏玛共和国为改善国际形象,摆脱外交孤立,发展经济,复兴德国大国地位,调整了对华政策。1920年,德国政府代表卜尔熙来华,谋求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磋商两国通商事宜。卜尔熙向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声明:德国政府愿“恢复中德之友谊及通商关系,因此项关系应基于完全平等及真切相互之主义,合于普遍国际法之条规者”。德政府“允认取消在华之领事裁判权,抛弃德国政府对于德国驻京使署所属操场上之全部权利于中国……并准备将中国各处收容德国军人之费偿还中国政府”<sup>④</sup>。1921年5月,中德双方签订了《中德协定》,标志着中德两国全面恢复了外交关系。德国承诺: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放弃在山东的一切权力、利益和特权;一次性支付给中国一笔赔款(作为战争期间拘留德国人的费用);偿还在德华人的资产;帮助在德中国留学生完成学业等。《中德协定》是中国第一次与列强之间在平等和互不歧视的基础上签订的。德国是一战后西方国家中第一个与中国缔结放弃在华所有不平等特权的国家<sup>⑤</sup>。同年,魏玛政府把瓦德西从中国掠夺的北京天文台的仪器归还中国。随着中德关系的正常化,德国在华发展的重点转向经济和文化领域。

德国汉学家福赫伯分析了中德政治关系对德国汉学发展的影响,他认为:“1898年德国租借胶州湾

① 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第5~7页。

② 卫茂平、马佳欣、郑霞:《异域的召唤——德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页。

③ 罗梅君等:《异国情调与现实——17世纪至20世纪中叶德国游记里的中国》,载刘善章:《中德关系史译文集》,第384~385页。

④ 吴景平:《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0)》,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0~121页。

⑤ 潘琪昌:《百年中德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70页。

后,德国的汉学也曾借此获得推动。但《凡尔赛和约》将胶州湾归还中国却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因为它使 1919 年以后德国对华关系不再有西方帝国主义对待东亚民族那样的负担。”德国汉学在一战后获得显著进步与中德政治关系的新发展密切相关<sup>①</sup>。1920 年曾到过柏林的沈来秋先生回忆当时德国社会的普遍氛围写道:“到德国的第一年,我走过不少城市,接触过不少社会人士,包括劳动群众。他们一般都对中国人表示好感,对东方文化感到兴趣……当时德国人一般的心理是:一方面极端厌战,祈求永久的和平,对于东方的哲学和宗教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不甘心在政治上屈服,对于西方列强存在着仇恨的心理。并且对西方文明发生怀疑,寻求另外出路。”<sup>②</sup>一战后中德关系的新发展,为中德文化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美国学者史景迁在其《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中指出:真正制约西方人眼中中国形象和图景的,最主要的还是西方自身的问题和需要。当代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也有同感:“每一项文化交流同样是为了维护交流者自身的利益”,“其自身利益都在于推动本民族的发展。”<sup>③</sup>

19 世纪末期以来,欧洲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和社会全面转型造成的社会阵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文明和文化的深刻危机,动摇了欧洲根深蒂固的欧洲优越论和“欧洲中心”思想,德国学者企图用中国哲学精神根治西方社会弊端,期待从东方寻回疗救自身的灵药和补正自身文化的方略。中欧、中德悠久的历史交往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德新型关系的确立,也为 19 世纪末期以来德国的中国文化热打下了良好基础。多重因素的交互影响、共同作用推动了 19 世纪末期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德国中国文化热的产生和升温。

● 作者简介:陈从阳,咸宁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湖北 咸宁 437100。

桂 莉,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编辑,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项目(2011jytl38)

● 责任编辑:涂文迁

① 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中华书局 1994 年,第 37~38 页。

② 沈来秋:《略谈辜鸿铭(节录)》,载黄兴涛:《旷世怪杰——名人笔下的辜鸿铭 辜鸿铭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中心 1998 年,第 156 页。

③ 顾 彬:《霍甫曼萨与中国》,载阿兰·李比雄、乐黛云:《跨文化对话》第 8 期,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2 年,第 148 页。